

情报失误研究回顾与展望

王秉^{1,2,3} 王渊洁^{1,2,3}

- (1. 中南大学资源与安全工程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3;
2. 中南大学安全理论创新与促进研究中心, 湖南 长沙 410083;
3. 中南大学安全科学与应急管理研究中心, 湖南 长沙 410083)

摘要: [目的/意义] 情报失误涉及军事战争、国家安全和商业竞争等领域, 会对组织决策产生严重不利影响, 了解情报失误研究进展, 有助于促进情报失误未来研究。[方法/过程] 首先, 回顾 20 世纪 40 年代至今的情报失误研究发展概况; 其次, 系统分析情报失误相关研究文献; 最后, 提出情报失误研究现存不足及未来需重点发力的方向。[结果/结论] 研究发现, 情报失误研究发展阶段包括萌芽时期、形成时期、发展时期和深化时期, 研究内容包括情报失误理论研究(具体包括情报失误概念研究、情报失误致因因素研究、情报失误学科交叉研究)与情报失误案例研究(具体包括二战时期、冷战时期和后冷战时期的案例)。此外, 情报失误研究在基础理论、泛化现象和规避策略方面研究不足。

关键词: 情报; 情报学; 情报失误; 情报失察

DOI: 10.3969/j.issn.1008-0821.2024.03.014

[中图分类号] G203; G25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0821 (2024) 03-0152-12

Research on Intelligence Failure: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Wang Bing^{1,2,3} Wang Yuanjie^{1,2,3}

- (1. School of Resources & Safety Engineering,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2. Safety & Security Theory Innovation and Promotion Center (STIPC),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3. Safety & Security Science and Emergency Management Center,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Intelligence failure (IF) occurs in many fields such as military, national security and commercial competition, which has a serious adverse impact on organizational decision-making. Therefore, understanding 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IF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promote the future research of IF. [Method/Process] Firstly, this paper reviewed the development of IF research since 1940s. Secondly,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analyzed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on IF research. Finally, it put forward the existing deficiencies and the future direction of IF research. [Result/Conclus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development stage of IF research includes the embryonic stage, the formation stage, the development stage, and the deepening stage. The research contents include theoretical research on IF (including the concept of IF, the causes of IF, and the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of IF) and case studies on IF (including the cases in World War II, Cold War and post-Cold War periods). In addition, the research of IF is insufficient in basic theory, generalization phenomenon and evasive strategy.

Key words: intelligence; intelligence science; intelligence failure; intelligence oversight

收稿日期: 2022-12-31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题目略”(项目编号: 22ZDA121)。

作者简介: 王秉 (1991-), 男, 特聘教授, 博士, 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 安全情报学、安全信息学与国家安全学等。王渊洁 (1996-), 男, 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安全情报学、应急情报学与国家安全学等。

“情报失误”源于对英文“Intelligence Failure”的翻译，是情报学一直备受关注的研究课题。关于情报失误研究意义，一方面，从理论层面看，情报失误研究是丰富情报学基础理论、扩展情报学学科边界的重要需求；另一方面，从实践层面看，情报失误研究有助于规避决策过程中的情报失误问题^[1-3]。情报失误研究现已成为国内外国家安全、军事战争和政治经济等多个领域共同面对的研究课题^[4-9]。目前，学界对情报失误的研究进展、研究内容和发展趋势缺乏一个清晰的整体认识和系统梳理，情报失误研究存在明显的不平衡性^[10]，这不利于情报失误研究的长远发展。因此，有必要对情报失误研究及其发展趋势等进行全面性和深层次的梳理，并为该领域未来研究提出相关对策建议。鉴于此，本文开展情报失误回顾与展望研究。

1 情报失误研究发展概况

情报失误研究发展可概括为 4 个时期，如图 1 所示，分别是萌芽时期(1940—1960)、形成时期(1960—1990)、发展时期(1990—2010)和深化时期(2010—至今)。在萌芽时期，情报失误研究成果零散，相关理论体系尚未形成；在形成时期，情报失误研究主要集中在军事案例讨论与失误因素分析方面；在发展时期，情报失误研究突破传统研究方法，并渗透到其他领域；在深化时期，情报失误研究理论体系得到深化，形成了“军事领域为主、多个领域融合”的研究态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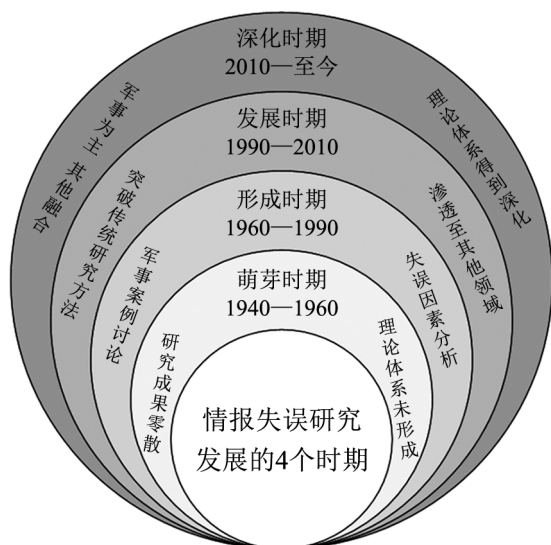


图 1 情报失误研究发展的 4 个时期

Fig. 1 Four Periods in the Development of Intelligence Failure Research

1.1 萌芽时期(1940—1960)

据考证，情报失误研究起源于二战时期的珍珠港事件^[10]。1941 年 12 月，珍珠港事件发生不久，美国国会迅速成立了“罗伯茨委员会(Roberts Commission)”对事件展开调查^[10-11]。此后，各国(地区)政府开始对情报失误现象高度重视，情报失误也成为西方情报界关注的热门话题。1944 年，Hobar 对德国军事情报失误进行了总结性研究；Drapper 从 1945 年开始搜集和发表二战时期美军情报失误的战例；Vandenbroucke 则结合猪湾事件，从认知角度对情报失误进行研究^[12]。

在情报失误发展的萌芽时期，从事情报失误研究的主要是专业的情报失误调查委员会及智囊机构(如罗伯茨委员会)，学界对于情报失误的研究尚处于初步探索阶段，研究内容主要面向二战及战后的军事冲突中的情报失误现象^[4]。此时，研究者们更多关注外界环境误导、情报工作流程和情报机构交流中的失误等，提出了许多情报机构改革和完善情报流程方面的建议^[4]。从研究成果看，该时期研究成果零散，主要是针对具体军事事件进行案例分析，服务战后情报机构的组织建设，尚未形成情报失误理论体系。但同时，这些研究成果为日后情报失误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基础资源和理论指导。

1.2 形成时期(1960—1990)

20 世纪 60 年代，一股批判现状、研究改革的社会思潮席卷美国，其规模与影响达到空前程度^[11]。在这种风气的带动下，整个西方(尤其美国)的知名学者、情报官员和记者等开始不断揭露曾经出现的情报失误现象(尤其军事领域)，调查情报失误的研究人员逐渐形成了一个学派，相关研究成果层出不穷^[11]。

1962 年，兰德公司高级顾问 Wohlstetter R^[13]出版著作《珍珠港：预警与决策(Pearl Harbor: Warning and Decision)》，并提出情报失误的“信号与噪音”理论。该著作随之成为情报失误理论研究方面的奠基之作，开启了学界对情报失误的理论探讨。从此，情报失误研究进入形成时期。1969 年，Kirkpatrick L B J^[14]出版著作《无眼的船长——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情报失误(Captains Without Eyes: Intelligence Failure in World War II)》，该著作研究了

二战期间的 5 个经典战役, 分析了情报在这些战役中的重要作用及如何避免情报失误。1982 年, Betts R K^[15] 在著作《突然袭击: 防御计划的教训 (Surprise Attack: Lessons for Defense Planning)》中以情报失误作为突然袭击研究的出发点, 从横向和纵向对情报失误进行考察 (横向因素涉及情报搜集手段、情报体制和情报分析预测等方面, 纵向因素涉及情报工作流程中的各个环节), 并认为情报失误主要在情报吸收转化阶段。1989 年, Handel M I^[16] 在 Wohlsetter R 的“信号与噪音”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三重噪音”理论, 对噪音进行了细化研究。其研究表明, 造成情报失误的噪音主要来源于 3 个方面: 对方 (敌方) 因素、国际环境因素和己方因素。同年, Berkowitz B D 等^[17] 出版书籍《服务于美国国家安全的战略情报 (Strategic Intelligence for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将情报信息分为事实 (公开渠道可以获得的情报)、秘密 (政府机关或情报组织刻意隐藏的信息)、错误信息 (对方故意为了误导和欺骗而混入的虚假事实) 和谜 (情报与政策的分解, 被认为是政策判断)^[18]。

在该时期, 世界仍处于冷战状态, 情报失误研究仍是以军事战争为核心, 围绕历史个案展开讨论, 并进行事件的还原与过程的解析。同时, 也开始有学者从其他角度研究情报失误。例如, 1979 年, Chen S 在期刊《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上讨论了导致情报失误的认知和组织因素, 并提出相关规避措施^[9]。Crow M M 等^[19] 从技术信息角度研究了政府决策中的权力和情报使用失误现象。可见, 情报失误研究出现了从军事战争走向政治、科技和经济等领域的趋势。

1.3 发展时期 (1990—2010)

20 世纪 90 年代, 随着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 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等发生巨变, 情报在各领域广泛受到重视, 情报失误研究也进入发展时期。该时期内, 情报失误研究内容不再局限于军事战争领域, 研究方法也突破传统的情报理论和分析方法, 逐步融合其他学科。例如, Heuer R J^[20] 开始从认知心理学角度解释情报失误问题, 于 1999 年出版著作《情报分析心理学 (Psychology of Intelligence Analysis)》, 并认为情报分析人员的认知偏好等心理因素

会对情报的最终结果产生重要影响。Rogers D^[21] 从经济角度出发, 将管理者的更替、新管理者对工作的影响作为企业发展信号进行了分析^[9]。麻智辉^[22] 通过案例论述了情报失误对经济造成的损失。

在情报失误逐渐拓展至其他领域的过程中, 军事战争领域的研究成果仍层出不穷。1991 年, Shulsky A N 等^[23] 在著作《无声的战争 (Silent Warfare: Understanding the World of Intelligence)》中提出情报失误的 4 个方面原因, 包括情报与政治的关系、情报供给不均衡、常规观念的影响以及镜像思维, 同时提出两个解决情报失误的办法: 重组情报分析制度和训练情报分析技能。Hughes-Wilson C J^[24] 编著《军事情报大失误 (Military Intelligence Blunders)》, 书中展示了著名军事事件中情报方面发生的错误和失误, 包括大量的欺骗、谎言和掩饰等。与此同时, 我国情报界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关注情报失误研究, 并发表了部分研究论文, 主要集中于情报失误案例分析^[22,25-28]。1998 年, 我国学者高金虎^[29] 编著《大失误: 20 世纪重大情报战之谜》, 试图解决情报领域研究中的两大问题: 情报对外界和战略决策的影响, 以及情报研判在国家的军事外交斗争中的作用^[18]。该著作标志着我国对情报失误研究的开端, 也是我国研究情报失误问题的首部代表之作。

进入新世纪后, “9·11” 恐怖袭击事件、伊拉克战争的爆发以及世界范围内的反恐斗争, 引起了各界对情报失误问题的高度重视, 情报失误研究得到进一步的发展。2005 年, Turner M A^[30] 编著《秘密情报为什么会失误 (Why Secret Intelligence Fails)》, 书中关于情报失误的探讨主要包括情报本身特质具有的失误、情报流程的失误以及反情报与秘密活动中的失误。2006 年, 张长军^[11] 在《美国情报失误研究》一书中从体制论、主体论和用户论 3 个角度对情报失误进行讨论, 并运用层次分析法对美国学者涉及的情报失误原因进行了剖析。2007 年, 张晓军^[31] 在著作《美国军事情报理论研究》中提及美国军事情报失误研究 (第三章), 探讨了军事情报失误的界定、评判标准, 并从情报的组织制度、生产者和用户 3 个方面对情报失误进行讨论。除专著外, 有关情报失误研究的文献和官方报道也不断涌现^[32-35]。总体来看, 该时期情报失

误研究的特点呈现范围广、角度多的特点,情报失误现象下的深层次历史、文化、环境等因素被逐一揭示出来,研究跨度和深度得到了进一步扩展^[4]。

1.4 深化时期(2010—至今)

2009年,国内学者赵小康等^[9]率先对情报失误(情报失察)的基础理论进行研究,他认为,情报失察已成为国内外军事、政治、经济和安全等领域共同面对的课题,需积极开展情报失误的基础理论探索研究。自2010年开始,国内情报失误研究逐渐分化出多个研究方向,进入了深化时期。例如,缪其浩^[36]提出需从情报失误的角度对重大经济损失进行调查;彭靖里等^[37]对我国企业技术创新中的竞争情报失误的案例进行剖析;王知津等^[38]研究了情报分析中的误判心理,探讨了误判心理对情报失误的影响;李纲等^[39]认为情报失误会影响突发事件的应急决策。与此同时,国外情报失误研究同样出现在各个领域。例如,Ingesson T^[40]提出情报机构应学习航空安全部门所采用的调查程序,以便在早期阶段更有效地处理轻微事件,并在重大事件的调查中避免争议;Lillbacka R^[41]认为,一个被称为“谢林陷阱”的自我强化过程可能会增加情报失误的可能性,并且对“谢林陷阱”作为情报失误驱动因素的模型进行评估;Maungwa T等^[42]从关键情报和信息需求的信息行为角度出发,探索了竞争情报失误的原因,包括信息沟通不足、信息分享不完整和信息表达困难等;Ostergard R L^[43]针对西非埃博拉疫情,利用解密的疫情信息,探讨了健康情报失误给疫情响应活动带来的阻碍。

作为情报失误研究的发源处和主阵地,军事战争领域的情报失误研究从未停止。2014年,罗卫萍^[10]编著《二战期间日本情报失误研究及思考》,该著作以二战期间日本情报失误为研究对象,全面考察了日本在情报搜集、分析和使用等环节中出现的失误,并从体制、文化和技术等多角度分析了失误原因。2017年,Bar-Joseph U等^[44]编著《情报的成功与失败:人的因素(Intelligence Success and Failure: The Human Factor)》,并通过案例比较,从人因角度对军事情报的成功和失败进行了全面的讨论。Karam J G^[45]回顾了1958年美国在伊拉克方面的情报失误并分析了相关原因;班文涛^[46]分析了美国对俄在叙军事行动的情报失误原因;Gunn

C^[47]探讨了在1960年土耳其军事政变中,美国究竟是成功地干预了此次政变,还是因发生情报失误而对此并不知情。

总而言之,目前国内外情报失误研究出现了多个领域“百花齐放”的场面,情报失误的内涵、外延、方法和应用等都得到了进一步深化,情报失误逐渐形成了“军事战争为主,多个领域融合”的研究现状。在高新科技不断发展、学科壁垒逐渐模糊的时代,情报失误研究在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数据信息技术的赋能下,积极与其他学科领域交叉融合,将会有更进一步的深化与发展。

2 情报失误研究内容分析

笔者以Web of Science数据库、CNKI数据库、万方数据库与维普数据库为数据源,以“(TI=‘情报失误’) OR (TI=‘情报失察’)”和“(TI=‘Intelligence Failure’)”等为检索式进行检索(检索时间截止2022年10月31日),分别检索出相关文献135篇、60篇、76篇和65篇。通过对所获国内外文献进行去重和人工排查发现,其中,中文CSSCI核心期刊(含扩展版)发文数量为40篇,外文文献中具有相关性的文章为62篇。基于这些国内外情报失误研究论文,结合上文提及的相关情报失误经典著作,可将情报失误研究内容分为情报失误理论研究和情报失误案例研究两大类,如图2所示。需要说明的是,情报失误理论研究和情报失误案例研究并非存在严格的区分,案例研究中难免会涉及部分理论内容,而理论研究中也可能会通过列举案例来阐述。

2.1 情报失误理论研究

一直以来,情报失误研究主要集中在实际案例的事实分析、原因调查、教训反思、经验分享和机制改革等实践研究,理论方面的探讨相对较少^[9]。根据目前研究现状,笔者将情报失误理论研究分为三大类,即情报失误概念研究、情报失误致因因素研究和情报失误学科交叉研究。

2.1.1 情报失误概念研究

“情报失误”自诞生以来就是一个不言自明的概念,处于情报失误研究前沿的美国学界对此也是一笔带过,或直接指出某事件是典型的情报失误案例,很少有研究去探讨情报失误的定义或概念。从表面看,情报界是未形成统一的情报失误评判标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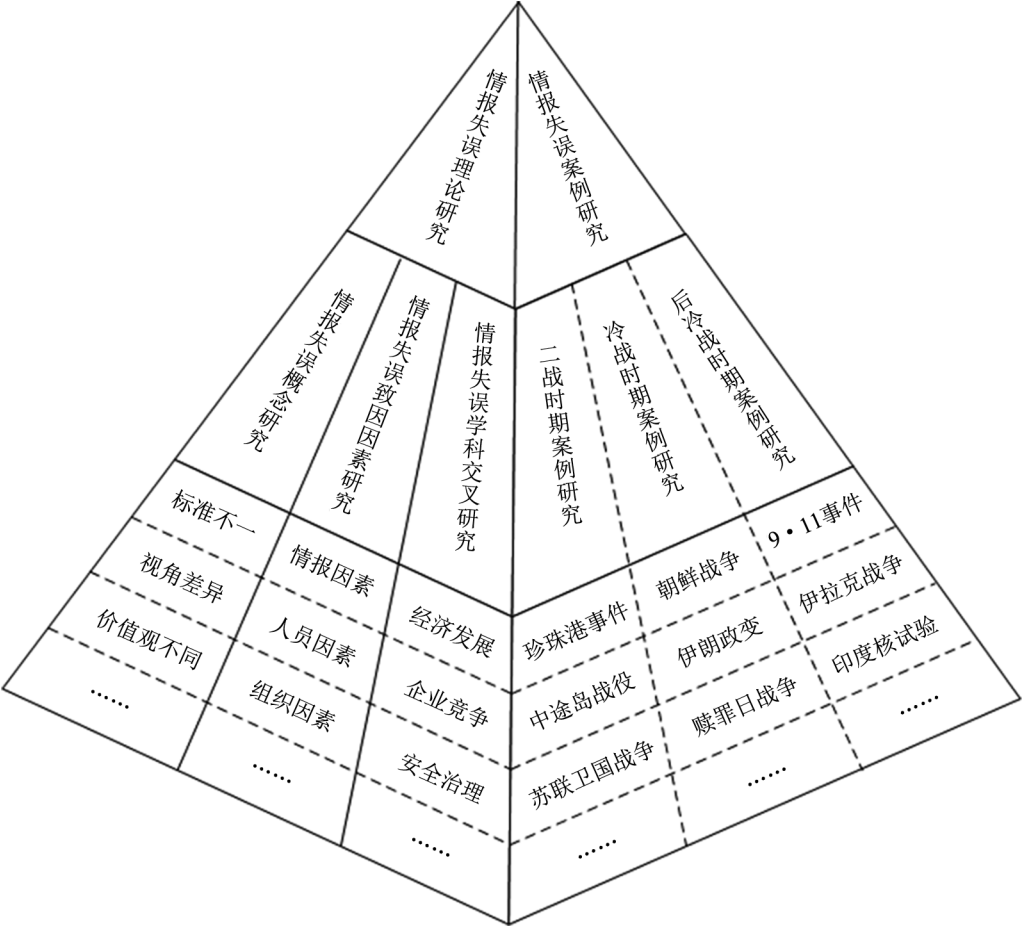


图 2 情报失误的研究内容分类
Fig. 2 Categorization of Research on Intelligence Failure

和公认的情报失误概念，但本质上却反映出情报界学者们对情报的不同认识。一方面是情报价值观不同，国外对于情报失误的研究集中于政治和军事领域，学者们对这些领域内情报的角色并未达成共识，因此很难形成统一的情报失误概念；另一方面是研究视角的差异，部分学者认为情报应积极参与并影

响决策的制定，另一部分学者认为情报的职责是提供中立客观的实时分析，是否使用情报产品则由决策者决定，与情报本身无关，因此，在从不同视角分析同一事件时，会对情报失误产生不同见解^[48]。鉴于此，本节列举出关于情报失误概念的代表性观点，如表 1 所示。

表 1 关于情报失误概念的代表性观点
Tab. 1 Representative Views on the Concept of Intelligence Failure

序号	提出者	代表性观点
1	赵小康 ^[1]	情报失误是指对某种趋势、某一事件的真实性或准确性的判断不符合客观实际，以及对某领域、某方向的情报缺乏必要的警惕性和敏感性，以至于并未开展相应工作
2	Betts R K ^[2]	广义而言，在情报的搜集、分析、传递和使用等过程中发生的失误现象，都属于情报失误的研究范畴
3	罗卫萍 ^[10]	情报失误是指情报流程中出现的一切失误，即涉及情报的生产阶段，也存在于情报的吸收与转化阶段，还包括贯穿情报工作始终的情报传递、情报指导和反情报工作中出现的失误等
4	Berkowitz B D 等 ^[17]	情报失误会出现在情报周期中的各个部分，任何环节的缺失都表示整个情报生产的失败
5	Shulsky A N 等 ^[23]	情报失误通常是指在获得相关资料的前提下，因分析过程中出现的混乱而导致对数据的忽略或错误解释

表 1 (续)

序号	提出者	代表性观点
6	Lowenthal M M ^[49]	情报失误是指因情报流程中各个环节不足而造成的现象, 环节包括情报的搜集、处理、加工、分析、生产、分发、使用和反馈
7	Gentry J A ^[50]	从国家层面看, 情报失误表示没有充分地收集和解释信息, 没有根据情报和其他因素制定健全的政策, 并且没有对重大事件做出预警和响应
8	Bar-Joseph U 等 ^[51]	情报失误表示情报机构在得到了充分信息后, 却由于其他因素而没有做出正确的分析研判的现象
9	Johnston R ^[52]	情报失误是因某种不正确的、不充分的、被忽略的或不合适的假定而导致出现系统性的、有组织的突袭
10	潘飞天 ^[53]	情报失误可发生在情报工作的各个环节, 但最主要还是发生在情报分析环节, 情报分析和决策人员的思维定势是导致情报分析失误的重要原因

尽管迄今为止, 仍然没有一个明确统一的标准去界定情报失误的概念, 但就已有观点而言, 仍可获悉情报失误概念的主要内容。基于此, 笔者在此拟给出情报失误的定义: 情报失误是指在情报工作过程中, 相关人员未能做到全面准确地收集、严谨科学地分析、稳定精准地传达、及时果断地使用情报, 进而造成经济损失、战役失败或政治摩擦等重大负面影响的现象。

2. 1. 2 情报失误致因因素研究

关于情报失误致因因素分析, 有学者按照情报失误原因剖析所采用的研究范式, 将其分为传统情报学派和现代情报学派^[4]。前者表示运用情报学理论及分析方法从情报工作本身寻找失误原因, 后者将范围拓展到决策者、组织环境和群体思考等方面, 涉及心理学、组织行为学等多学科。基于此, 笔者将情报失误致因因素现有研究归纳为 3 个方面, 包括情报层面因素、人员层面因素和组织层面因素, 并列举相关研究内容如表 2 所示。

表 2 情报失误致因因素研究归纳
Tab. 2 Summary of Research on Factors Contributing to Intelligence Failure

致因因素	致因因素解释	研究内容列举
情报层面因素	由于情报自身属性特点或情报工作流程本身的缺陷而易造成情报失误的相关因素, 主要依据是情报学基础理论	赵小康 ^[1] 将情报失误因素归纳为情报规划、情报体制、情报文化和情报产品质量 4 个方面, 并运用结构模型分析方法构建了情报失察模型, 对这些因素做出定量分析
		Phythian M ^[54] 探讨了在情报循环过程中可能会发生情报失误的节点, 并描述了情报失误的动态过程
		赵丽娟等 ^[55] 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 探究了信息不对称与情报失误之间的内在联系, 分析了情报活动中信息不对称的具体表现(信息匮乏和信息超载)
		O'Leary J ^[56] 分析了(军事)情报流程中导致情报失误的基本元素, 并提出规避情报失误的技术和难点
人员层面因素	由于情报活动中的相关人员(主要是情报生产者和情报用户)的心理、性格等个体特征而导致情报失误的相关因素, 主要依据是(认知)心理学理论	王知津等 ^[38] 研究了情报分析人员心理因素对情报失误的影响, 并提出了 7 种易导致情报失误的心理倾向
		Bar-Joseph U 等 ^[51] 提出情报生产者的工作方式和特点决定了决策者接受他们的劳动成果的方式, 并运用心理学理论讨论了决策者和情报产品间的关系
		王大龙 ^[58] 基于情报决策者的非理性决策, 指出认知偏差与认知一致性倾向是导致情报失误的两个重要原因, 并阐述了决策者心理因素对情报失误的影响
		沈固朝 ^[57] 探讨了情报分析人员和决策者的关系, 阐释关于预警障碍、认知失调、情报政治化和群组思考等问题, 提出要从认知学和文化学角度对情报失误进行研究

表 2 (续)

致因因素	致因因素解释	研究内容列举
组织层面因素	与情报组织相关的制度、规则和内部冲突易造成情报失误的相关因素，主要依据是组织行为学和组织经济学理论	杨晓宁 ^[59] 考察了情报分析中组织研究的必要性，提出情报失误组织层面的因素（组织中的政治冲突、内部规则及学习过程），并给出了相关控制策略
		Garicano L 等 ^[60] 运用组织经济学的理论分析了美国多个情报相关委员在关于如何防止情报失误的讨论中提出的组织方面的问题
		张力 ^[61] 通过对古巴导弹危机爆发前的《国家情报评估》进行文本和背景分析，从组织角度对国家情报评估出现的情报失误进行了解释和说明
		Gentry J A ^[50] 提出，情报机构的任务与情报部门在组织中的定位之间的矛盾，会引起情报失误现象的发生

2.1.3 情报失误学科交叉研究

近年来，情报失误研究不断融合其他学科，并产出诸多成果，主要涉及经济发展、企业竞争安全（应急）管理等多个学科或领域。具体研究内容如下：

1) 经济发展方面。麻智辉^[22]和缪其浩^[36]提出，情报失误对经济活动具有重要影响，关于重大的经济损失事件应从情报失误角度进行调查研究。丁波涛^[8]系统梳理了“一带一路”情报工作各个环节中的情报失误，分析了该现象背后的情报能力、体制和文化方面的原因，并提出了相关改进建议。

2) 企业竞争方面。赵小康等^[62]分析了企业决策者产生情报失误的原因，主要包括自我意识膨胀、独断专行、低估运营中的困难、固守过时经验以及个人偏好 5 个方面。慕慧鸽等^[63]从开展企业情报工作的各个环节入手，对导致企业情报失察的原因进行了系统性分析。Maungwa T 等^[42]使用定性和有限的定量研究方法，发现竞争情报失误的原因包括情报用户和情报生产者直接沟通不足、对情报需求认识有差异以及表达困难或不完整等。

3) 安全（应急）管理方面。王秉等^[7,64]从安全科学和情报学交叉研究的角度出发，面向安全管理，运用 WSR 系统方法论，对安全情报失误的致因模型、致因因素和规避策略进行了深入完整的研究。李纲等^[39]基于情报失误理论，分析了造成突发事件情报失误的主要原因，包括情报主体认知偏差、突发事件信息系统的缺陷和协同问题，以及突发事件情报文化的影响。陈彬等^[65]构建了灾害应急情报失误分析框架，讨论了 WSR 三元视角下灾害应急情报失误的成因，并提出相关防范策略。

4) 其他方面。Ostergard R L^[43]利用解密的疫情信息，探讨了西非埃博拉疫情防控中健康情报失误给疫情防控活动带来的阻碍。周玲^[66]研究了危机管理中导致情报失误的因素，主要包括交流问题、官僚政治问题和心理障碍问题等。周西平^[6]从公安情报人员的心理认知过程出发，研究了公安情报失误中思维定势和认知差异层面的原因。江信昱^[67]阐述了情报失误与科学传播的关系，并以转基因技术为例，探讨了科学传播中科技情报产品传播与使用失误的现象及原因。

2.2 情报失误案例研究

情报失误研究源于历史事件，其特殊性在于难以通过实验方式对理论进行求证，需要通过案例分析来获取解释性的理论，借助已发生的事件去进行总结和预见^[4,31]。情报失误相关研究文献表明，“珍珠港”事件、苏联卫国战争、朝鲜战争、伊朗政变、印度核试验、“9·11”事件以及伊拉克战争等，一直是情报失误研究的经典案例，诸多学者已从不同角度、不同学科视角对这些案例展开分析。本节将情报失误案例研究划分为 3 个时期，分别是二战时期、冷战时期以及后冷战时期，并对不同时期的研究进行回顾与总结。

2.2.1 二战时期的情报失误案例研究

1941 年，“珍珠港”事件的爆发使得孤立主义盛行的美国陷入深思。由于该事件，“情报失误”“突然袭击”等成为了美国政府、军方、情报界以及学界十分关注的热门话题。“珍珠港”事件也成为二战期间情报失误的最经典案例，给学界留下了很多值得研究和探索的内容。Wohlstetter R^[13]最早提出“信号与噪音”理论，其主要观点为：①信

号是模糊不定的；②信号中总会夹杂噪音；③噪音来源包括偶发噪音、对方（敌方）噪音和己方噪音；④当信噪比低于一定阈值时，情报分析人员会被噪音干扰，导致错误研判，发生情报失误。高金虎^[25]通过对比研究，将“珍珠港”事件中情报失误的原因主要归结在情报分析方面，包括情报分析失误、情报分析人员受到噪音干扰、情报分析人员先入为主、情报人员文化背景差异以及“狼来了”效应而产生的麻痹心理。栗诗等^[68]对引起珍珠港情报失误的因素进行了思考，认为主要包括缺乏综合协调性情报机构、噪音干扰、情报分析人员的直觉错误和忽视战略情报的分析应用等原因。

除“珍珠港”事件外，二战时期的其他战役也不免发生情报失误现象。Kirkpatrick L B J^[14]记述了二战中存在重大情报失误的 5 次战役（德国入侵苏联、日本袭击美国、英国与加拿大对法国港口迪耶普的突袭、盟军在阿纳姆的空降作战以及德国在阿登地区发动的进攻），同时总结了引起情报失误的原因，主要包括情报准备不足、情报处理方式不合理以及领导者个人因素等。王亮^[32]分析了苏联卫国战争初期情报失误的原因，包括情报过分迎合上级意图而丧失客观性、情报分析研究力度不够、缺乏对德军战术情报的搜集与分析以及“大清洗”运动使情报人才严重缺乏。罗卫萍^[35]对中途岛战役时日方的情报失误进行了剖析，日方盲目自信的“胜利病”、因循守旧的传统心理和情报与决策的脱节被认为是情报失误的主要原因，最终造成了战略判断失误、敌情判断不准、战场侦察不力和保密工作不严等一系列重大错误。阮春良^[69]认为，二战时期苏德战争前出现了一系列情报失误，其原因既有苏联主要领导人斯大林的先入之见，以及对情报人员和机构不够信任的原因，又有苏联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和情报体制排斥一切不同声音的原因等。

2.2.2 冷战时期的情报失误案例研究

从 1946 年英国前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发表“铁幕演说”，到 1991 年华约解散以及苏联解体，以美国与苏联为首的两大军事集团之间的对峙持续了将近半个世纪。在冷战时期，局部战争不计其数，情报机构常设化、情报人员专家化和情报技术智能化成为了该时期情报工作最主要的特点^[68]。20 世纪

50 年代的朝鲜战争是冷战初期爆发的一场多达 20 国参与的大规模局部战争，在情报失误方面也是典型案例，诸多学者对其进行了深入研究。于彦周^[70]认为，从文化背景来看，美国对中国出兵朝鲜情报判断失误的原因，主要涉及中国人民的美国观、中国人的国家安全战略哲学和中国人民“重义”“自立”的优秀民族品质。美国政府不理解中国人的民族心理性格，忽略中国人民的自主意识，以致做出了错误判断。蒋飞等^[71]将批判性思维引入情报研究，分析了朝鲜战争时美军情报分析存在的认知偏见，并提出利用批判性思维改善情报分析认知偏见的 12 种基本智力技能。Corrado J^[72]提出，要积极反思美国情报机构和政策制定者为何没能预测到朝鲜的进攻以及中国加入朝鲜战争，他认为认知偏差导致了错误的假设和模糊的结论，情报分析人员应识别和改善认知偏差的影响，从敌方角度考虑风险/回报因素。

此外，针对冷战时期中其他情报失误的案例，学者们也在不断反思与研究。钱峰^[27]评析了猪湾事件前后美国中央情报局（CIA）所犯的情报失误，得出情报失误的 4 点原因：CIA 的心态过于骄狂自大、太倚重准军事行动而排斥情报分析、监控体制和分权制衡机制不足、保密和反情报工作不力。Connolly M 等^[73]通过使用包括通讯流量分析和情感分析在内的几种技术，对作为情报失败典型案例的伊朗伊斯兰革命事件进行了分析，他们发现伊朗官员没有强调局势的严重性，并且美国政府的官员被其他事件分散了注意力，反应非常迟缓，最终导致情报失误的发生。赵申洪等^[74]利用解密的美军军事及外交档案，系统梳理了美军在“马亚克斯”事件中出现多个情报失误（如船员位置判断失误、守岛兵力判断失误、登陆点选择失误）及其成因（如情报未能及时上报和分发给作战部队）。Rezk D^[75]从文化视角重新评估了第四次中东战争（赎罪日战争）中的情报失误，对阿拉伯文化的错误理解与判断是多个情报失误的原因，这篇文章也阐明了文化思想在国际历史中的重要作用。

2.2.3 后冷战时期情报失误案例研究

冷战结束后，美国作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开始不断攫取“世界警察”的职责和权威，冲击

冷战时期形成的国际秩序对美国来说已成为一种必然,随之而来的局部战争、恐怖袭击和核武器事件更是连续不断。因此,关于情报失误案例研究也不断涌现。张晓平^[28]分析了美国在印度核试验事件中的情报失误原因,包括美国决策层低估了印度研发核武器的决心,印度对美国的情报搜集手段采取了欺骗措施,以及美国情报部门对有限情报分析不足。班文涛^[46]讨论了美国对俄罗斯在叙利亚军事行动的情报失误原因和结果,客观层面有俄军行动欺骗性较强、美方决策层关注度不高和情报合作效果不好;主观层面有美国对开源情报重视不足、战略分析能力不足和情报预测水平有限,造成了决策迟缓、错失良机的后果。刘肖岩^[76]研究了 1994—2004 年俄罗斯反恐行动,认为社会环境不利于人力情报获取,情报系统自身内部存在问题,以及对预警情报敏感度不够是俄罗斯反恐行动中情报失误的主要原因。此外, Borch F L^[5]、Betts R K^[77]、Hannay D^[78]和 Jervis R^[79]等国外诸多学者从多方面对“9·11”恐怖袭击事件和伊拉克战争中的情报失误进行了评估、思考和重新认识。

3 情报失误研究现存不足分析与未来展望

3.1 现存不足分析

通过上述对情报失误研究发展概况的梳理和研究内容的回顾,可以发现,近年来情报失误研究取得了一定进展,但笔者认为目前在 3 个方面仍有待提高,分别是情报失误基础理论有待研究、泛化现象有待审视以及规避策略有待提出。具体内容如下:

1) 情报失误基础理论有待研究

从现有文献看,绝大部分研究关注情报失误具体案例分析(特别是政治与军事),或从某一视角探讨情报失误的原因,整体研究呈现出碎片化特征。由具体案例纵深分析得出的结论,往往是基于该案例的特定条件,缺乏普适、通用的理论价值;从某一视角(如认知心理学)研究情报失误的致因因素,却又往往因强调该视角而忽视其他因素,难免有失偏颇^[4]。可见,情报失误研究缺乏对基础理论的探索。以情报失误的基本概念为例,自从“情报失误(Intelligence Failure)”这一术语诞生以来,西方出现了大量以情报失误为研究对象的著作,社会各界常抱以极大热情参与对情报失误的讨论。但令人

困惑的是,很少有人专门定义何为情报失误,相关信息不仅无法在官方出版的专门词典和相关条令规定中获取,就连学者们也很少对其加以界定^[31]。此外,国内学者对“Intelligence Failure”这一术语的翻译也不明确,目前存在“情报失误”“情报失察”及“情报失灵”等术语混用的现象,容易造成概念混淆,不利于情报失误研究的发展。类似的,诸如情报失误的内涵、外延、特点和功能等诸基础理论仍需进一步研究。

2) 情报失误泛化现象有待审视

早期情报研究的发展很大程度得益于美国情报界和军方在事件结束之后(不论失败与否)进行深刻检讨和反思教训的“乌鸦文化”。因此,情报失误研究往往是在“失败”和“危机”等负面背景下展开,通过对事件中经验教训的总结,探寻情报失误的原因和规律,并对具体事件从情报失误角度进行解释。然而,这种方式使情报失误泛化和滥用的现象也随之产生。一些研究倾向将事件失败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都归因于情报失误,似乎任何事件的失败都能够以情报失误为理由进行解释,这使得对事件失败的因素分析产生了情报失误方面的路径依赖,引起事件归因的方向性错误和责任归属的错位,同时,也将导致情报失误研究失去应有的科学和严谨^[3]。因此,在研究情报失误时,要秉承“情报失误是事件失败或危机出现的重要因素,但并非唯一因素”这一原则,尽量避免情报失误泛化现象。

3) 情报失误规避策略有待提出

现有的绝大多数研究一般都将情报失误的原因置于重点研究内容,不论是情报失误理论研究,还是情报失误案例研究,都会对失误原因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深入剖析。而在剖析原因之后,在情报失误规避策略方面的研究却往往不尽如人意,许多研究仅仅会给出一些理论上的建议而非实际的应对措施。从情报失误原因的角度看,提出具有实际操作性的规避策略确有难度,因为情报失误的原因本身就复杂多样,涉及组织层面、个体层面及情报自身层面等多方面因素。因此,运用多种理论方法,探索面向各种情境且具备可操作性的情报失误规避策略是未来情报失误研究的重要发展方向之一^[4,64]。

3.2 未来展望

1) 加大情报失误基础理论研究力度

随着时代的发展,情报学从研究“战时关于敌情之报告”,到“他方之秘密”,再到“从数据、信息和知识进行提炼萃取的产物”,不断地扩展着学科发展边界^[80-81]。在当下数据信息爆发式增长的时代,情报的价值越发得以凸显,情报对于任何领域的决策来说,都是必不可少和至关重要的支撑。因此,对情报失误的基础理论研究至关重要。首先,情报失误基础理论研究应跳出具体案例或某单一视角,从众多具体案例中提取关联信息和经验教训,深入探索情报失误的普遍客观规律,构建具备普适性和通用性的基础理论框架;其次,情报失误基础理论研究要放眼整个决策领域,积极将情报失误通用理论应用于政治、经济、军事和科技等多个领域,并在此过程中结合领域自身特点不断创新和发展新理论;最后,通过运用相关理论对各领域的情报失误实际案例进行阐释和分析,进一步对所构建的基础理论框架进行验证,不断丰富和完善情报失误理论体系。

2) 科技与方法赋能情报失误致因因素及规避策略研究

随着科技的发展和多学科方法的融合,通过技术赋能来探究情报失误的致因因素,避免情报失误泛化现象,以及提出针对性的规避策略,是情报失误未来研究需重点关注的问题。一方面,情报失误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科技的推力,科技成果使得情报失误研究的技术手段不断丰富^[82]。在当下高新科技引领的数智时代,情报失误研究应借助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技术,主动分析各领域情报失误状况,探索情报失误致因因素并提供相关规避策略建议,进而做好情报服务工作;另一方面,情报失误研究应从跨学科视角出发,积极运用社会学、心理学、传播学、经济学、管理学和行为学等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揭示情报失误所蕴藏的致因因素、特征及规律^[83],并做好相关规避预防工作。总之,基于科技发展与学科融合的大趋势,情报失误研究思路应从“被动式”研究转变为“主动式”研究,既要已知事件的情报失误原因进行剖析,又要关注如何规避情报失误和未知事件的发生,以

“上医治未病”的思想引领和发展“预防为主”的主动式情报失误研究。

3) 创新发展服务于国家重大战略的情报失误研究模式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善于科学合理地规避国家战略层面的情报失误,是保持我国军事、外交、经济、科技等多个领域竞争优势的重要前提。从国家战略层面来看,我国情报工作主要是为国家智库、国家安全和国家竞争提供服务^[84]。首先,在国家智库服务方面,情报是智库咨询研究的前端支撑^[85],智库则依据情报为决策者提供相关建议进而辅助决策。因此,情报失误研究应重点关注智库的情报来源、获取途径、分析手段及是否安全可靠等问题,防止智库发生情报失误而影响决策;其次,在国家安全服务方面,情报失误研究要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思想,提升国家安全与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和情报意识,大力建设面向国家安全的情报体系,积极监测国家安全情报活动中的突发情况和异常活动,防止情报失误,维护国家安全;最后,在国家竞争方面,情报失误研究同样具有重要作用。在我国向着经济强国、科技强国和军事强国迈进的过程中,面临着贸易战、科技封锁和地缘冲突等蓄意事件,情报(尤其是竞争情报、金融情报和科技情报等)在其中的作用不言而喻。因此,情报失误研究应关注各类竞争事件的本质及战略意图等,通过提供最优情报来协助化解各类风险与挑战,避免因情报失误给国家带来巨大损失。总体而言,国家利益与情报工作密不可分,情报失误研究服务于国家重大战略是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

参 考 文 献

- [1] 赵小康. 导致决策失误的情报失察研究: 成因分解与实证模型[J]. 情报理论与实践, 2010, 33 (9): 12-16.
- [2] Betts R K. Analysis, War, and Decision: Why Intelligence Failures Are Inevitable [J]. World Politics, 1978, 31 (1): 61-89.
- [3] 陈德, 刘杰. 决策失误归因中“情报失察”泛化现象检视[J]. 情报杂志, 2019, 38 (9): 20-23, 13.
- [4] 江洁, 徐志峰. 国内外情报失察研究述评[J]. 图书情报工作, 2011, 55 (6): 24-28.
- [5] Borch F L. Comparing Pearl Harbor and “9/11”: Intelligence Failure? American Unpreparedness? Military Responsibility? [J]. The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2003, 67 (3): 845-860.

- [6] 周西平. 公安情报失误的认知心理分析 [J]. 图书馆学研究, 2012, (21): 5-7, 4.
- [7] 王秉, 王渊洁. 安全情报失误成因模型研究 [J]. 情报理论与实践, 2021, 44 (1): 36-41.
- [8] 丁波涛. “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中的情报失察问题研究 [J]. 情报理论与实践, 2020, 43 (9): 1-6.
- [9] 赵小康, 董悦. 情报失察的理论基础研究 [J]. 情报科学, 2009, 27 (8): 1230-1234.
- [10] 罗卫萍. 二战期间日本情报失误研究及思考 [M]. 北京: 时事出版社, 2014.
- [11] 张长军. 美国情报失误研究 [M]. 北京: 军事科学出版社, 2006.
- [12] Calder J D. Intelligence, Espionage and Related Topics: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Serial, Journal, and Magazine Scholarship, 1844—1998 [M]. Connecticut: Greenwood Press, 1999.
- [13] Wohlstetter R. Pearl Harbor: Warning and Decision [M]. San Francisco: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 [14] Kirkpatrick L B J. Captains Without Eyes: Intelligence Failure in World War II [M]. New York: Macmillan, 1969.
- [15] Betts R K. Surprise Attack: Lessons for Defense Planning [M]. Washington: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82.
- [16] Handel M I. War, Strategy, and Intelligence [M]. London: F. Cass, 1989.
- [17] Berkowitz B D, Goodman A E. Strategic Intelligence for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 [18] 李培玲. Intelligence Studies 视阈下的情报失误原因及规避策略研究 [D]. 北京: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2019.
- [19] Crow M M, Uday D. Failures of Power and Intelligence Use of Science Use of Scientific-technical Information in Government Decision Making [J]. Administration & Society, 1983, 15 (2): 185-206.
- [20] Heuer R J. Psychology of Intelligence Analysis [M]. Washington: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Intelligenc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1999.
- [21] Rogers D. Bliley's Pro-business Reputation, Stock Portfolio Symbolize Postelection Strength of Corporation [J]. Wall Street Journal-Eastern Edition, 1994, 224 (123): A12.
- [22] 麻智辉. 谈情报失误造成的经济损失 [J]. 现代情报, 1992, (3): 18-19.
- [23] Shulsky A N, Schmitt G J. Silent Warfare: Understanding the World of Intelligence [M]. Washington: Potomac Books Inc, 1991.
- [24] Hughes-Wilson C J. Military Intelligence Blunders [M]. New York: Carroll & Graf Publishers, Inc, 1999.
- [25] 高金虎. 从珍珠港事件和古巴导弹危机看情报失误的原因 [J]. 情报杂志, 1995, (3): 71-73.
- [26] 翟晓敏, 高金虎. 美国在珍珠港事件前的情报失误——“罗斯福阴谋”驳论 [J]. 世界历史, 1995, (5): 96-102.
- [27] 钱峰. 猪湾事件前后中央情报局情报失误评析 [J]. 情报杂志, 1997, (5): 76-78.
- [28] 张晓平. 论美国在印度核试验事件中的情报失误 [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1998, (6): 103-107.
- [29] 高金虎. 大失误: 20世纪重大情报战之谜 [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8.
- [30] Turner M A. Why Secret Intelligence Fails [M]. Dulles: Potomac Books Inc, 2005.
- [31] 张晓军. 美国军事情报理论研究 [M]. 北京: 军事科学出版社, 2007.
- [32] 王亮. 苏联卫国战争初期情报失误原因再思考及启示 [J]. 情报杂志, 2003, (8): 99-100, 98.
- [33] 严锋, 谭卫兵. 美应对情报失误反省 [N]. 人民日报, 2004-01-30.
- [34] 方祥生. “情报失误”的尴尬 [N]. 光明日报, 2004-02-02.
- [35] 罗卫萍. 从珍珠港到中途岛——太平洋战争前期日本情报失误研究 [J]. 军事历史研究, 2008, (2): 134-139.
- [36] 缪其浩. 重大经济损失需要情报失察调查 [J]. 竞争情报, 2009, (3): 1.
- [37] 彭靖里, 张勇, 可星. 我国企业技术创新过程中竞争情报失察的案例剖析 [J]. 竞争情报, 2010, (3): 27-30.
- [38] 王知津, 王树义. 情报分析中的误判心理及其对情报失察的影响 [J]. 图书情报工作, 2011, 55 (16): 12-15, 24.
- [39] 李纲, 李阳. 关于突发事件情报失察的若干探讨 [J]. 情报理论与实践, 2015, 38 (7): 1-6.
- [40] Ingesson T. Beyond Blame: What Investigations of Intelligence Failures Can Learn from Aviation Safety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lligence and Counterintelligence, 2021, 35 (3): 1-16.
- [41] Lillbacka R. Schelling Traps as Drivers of Intelligence Failure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lligence and Counterintelligence, 2022, 35 (1): 101-130.
- [42] Maungwa T, Fourie I. Competitive Intelligence Failures: An Information Behaviour Lens to Key Intelligence and Information Needs [J]. Aslib Journa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2018, 70 (4): 367-389.
- [43] Ostergard R L. The West Africa Ebola Outbreak (2014—2016): A Health Intelligence Failure? [J]. Intelligence and National Security, 2020, 35 (4): 477-492.
- [44] Bar-Joseph U, McDermott R. Intelligence Success and Failure: The Human Factor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 [45] Karam J G. Missing Revolution: The American Intelligence Failure in Iraq, 1958 [J]. Intelligence and National Security, 2017, 32 (6): 693-709.
- [46] 班文涛. 美国对俄在叙军事行动的情报失误原因及结果分析 [J]. 情报杂志, 2020, 39 (4): 1-4.
- [47] Gunn C. The 1960 Coup in Turkey: A U. S. Intelligence Failure or a Successful Intervention? [J].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2015, 17 (2): 103-139.

- [48] 江洁. 企业情报失察: 现状、成因与对策研究 [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3.
- [49] Lowenthal M M. Intelligence: From Secrets to Policy [M]. Thousand Oaks, California: SAGE/CQ Press, 2020.
- [50] Gentry J A. Intelligence Failure Reframed [J].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2008, 123 (2): 247-270.
- [51] Bar-Joseph U, Kruglanski A W. Intelligence Failure and Need for Cognitive Closure: On the Psychology of the Yom Kippur Surprise [J]. Political Psychology, 2003, 24 (1): 75-99.
- [52] Johnston R. Analytic Culture in the United States Intelligence Community: An Ethnographic Study [M]. Washington: CIA's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Intelligence, 2005.
- [53] 潘飞天. 谈如何克服情报分析失误中的思维定势 [J]. 情报杂志, 2001, (9): 56-58.
- [54] Phythian M. The Perfect Intelligence Failure? US Pre-war Intelligence on Iraqi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J]. Politics & Policy, 2006, 34 (2): 400-424.
- [55] 赵丽娟, 王大龙. 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的情报失察研究 [J]. 情报探索, 2012, (10): 1-4.
- [56] O'Leary J. Surprise and Intelligence [J]. Air Power Journal, 1997, 8 (1): 34-51.
- [57] 沈固朝. 情报失察——西方情报研究的重要课题及其对我们的启示 [J]. 图书情报工作, 2009, 53 (2): 34-37.
- [58] 王大龙. 基于情报决策者非理性决策的情报失察研究 [J]. 现代情报, 2011, 31 (8): 18-20.
- [59] 杨晓宁. 情报失察的组织因素及其控制 [J]. 情报杂志, 2018, 37 (5): 26-30.
- [60] Garicano L, Posner R A. Intelligence Failures: An Organizational Economics Perspective [J].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05, 19 (4): 151-170.
- [61] 张力. 美国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的情报失误——从组织理论视角对《国家情报评估》的分析 [J]. 情报杂志, 2017, 36 (8): 1-5, 22.
- [62] 赵小康, 李伟超, 周志远. 企业决策者情报失察成因分析 [J]. 情报探索, 2009, (11): 43-45.
- [63] 慕慧鸽, 李伟华. 基于情报工作各环节视角的企业情报失察成因分析 [J]. 商, 2012, (6): 154-155.
- [64] 王秉, 王渊洁. 安全管理中的安全情报失误影响因素分析 [J]. 情报杂志, 2021, 40 (2): 176-181, 89.
- [65] 陈彬, 高峰. WSR 视域下灾害应急情报失误成因及对策研究 [J]. 竞争情报, 2022, 18 (5): 14-22.
- [66] 周玲. 危机管理中导致情报失误的因素 [J]. 情报杂志, 2005, (3): 81-84.
- [67] 江信显. 科学传播中的科技情报产品传播失误研究 [J]. 情报杂志, 2014, 33 (8): 42-47, 5.
- [68] 粟诗, 寒田原. 对珍珠港事件情报失误的思考 [J]. 情报杂志, 2011, 30 (S2): 4-5, 8.
- [69] 阮春良. 二战苏联情报失误原因探析 [J]. 山东社会科学, 2012, (S2): 193-194.
- [70] 于彦周. 美国对中国出兵朝鲜情报判断失误的文化透视 [J]. 情报杂志, 1999, (1): 91-93.
- [71] 蒋飞, 张静, 杜娜. 用批判性思维改善情报分析中的认知偏见——以朝鲜战争中美军情报失误为例 [J]. 情报杂志, 2013, 32 (11): 92-94, 100.
- [72] Corrado J. Rethinking Intelligence Failure: China's Intervention in the Korean War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lligence and CounterIntelligence, 2023, 3 (3): 199-219.
- [73] Connolly M, Hicks R, Jervis R, et al. New Evidence and New Methods for Analyzing the Iranian Revolution as an Intelligence Failure [J]. Intelligence and National Security, 2021, 36 (6): 781-806.
- [74] 赵申洪, 汪明敏. 美国在“马亚克斯”事件中的情报失误及其启示 [J]. 情报杂志, 2021, 40 (4): 13-20, 4.
- [75] Rezk D. Re-evaluating the Yom Kippur 'Intelligence Failure': The Cultural Lens in Crisis [J]. 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2017, 39 (3): 470-495.
- [76] 刘肖岩. 俄罗斯反恐情报失误研究 [J]. 武警学院学报, 2010, 26 (5): 90-93.
- [77] Betts R K. Two Faces of Intelligence Failure: September 11 and Iraq's Missing WMD [J].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2007, 122 (4): 585-606.
- [78] Hannay D. Three Iraq Intelligence Failures Reconsidered [J]. Survival, 2009, 51 (6): 13-20.
- [79] Jervis R. Reports, Politics, and Intelligence Failures: The Case of Iraq [J].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2006, 29 (1): 3-52.
- [80] 马费成, 李志元. 中国当代情报学的起源及发展 [J]. 情报学报, 2021, 40 (5): 547-554.
- [81] 包昌火, 刘彦君, 张婧, 等. 中国情报学论纲 [J]. 情报杂志, 2018, 37 (1): 1-8.
- [82] 苏新宁.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展望情报学与情报工作的未来 [J]. 科技情报研究, 2019, 1 (1): 1-12.
- [83] 马费成, 张帅. 中国当代情报学的发展路径与本土特色 [J]. 情报理论与实践, 2021, 44 (7): 15-21.
- [84] 李树青, 周小康, 丁晓蔚, 等. 面向国家战略层面和社会应用层面的我国情报学学科发展定位及其思考 [J]. 图书情报知识, 2020, (5): 54-67.
- [85] 袁建霞, 董瑜, 张薇. 论情报研究在我国智库建设中的作用 [J]. 情报杂志, 2015, 34 (4): 4-7.

(责任编辑: 郭沫含)